

從某種角度上講，歷史是一種詮釋學。當然社會學、哲學、文學……哪一門社會科學不是詮釋學，只不過詮釋了不同的對象與範疇。社會學詮釋了人類的社會行為，哲學詮釋了介於生死之間人的靈悟……。在中國文化裏，「歷史」這個詞本身就帶有沉重的意味，但它的沉重所在，就是思考的耗勞。

頗為細緻的考察，折射出宏大的歷史場域。一部成功的學術著作，必然是結合了揭示人類普遍性的「博」和具有獨特對象、視角的「精」，套用一句話，叫做「主題是世界的，對象是民族的」。差異性的選材下，蘊含着人類普世的通感，讓讀者「享受」詮釋的魅力，體悟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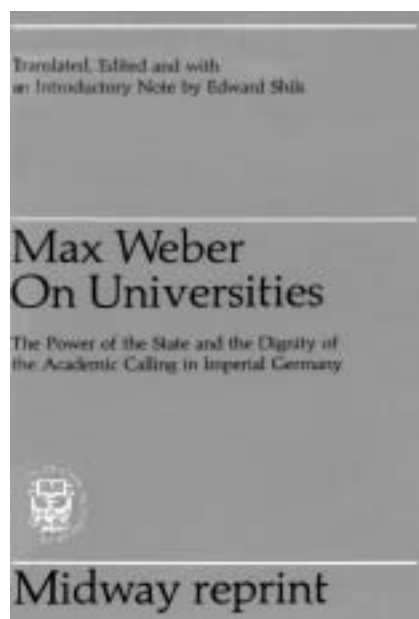
從某種角度上講，歷史是一種詮釋學。當然社會學、哲學、文學……哪一門社會科學不是詮釋學，只不過詮釋了不同的對象與範疇。社會學詮釋了人類的社會行為，哲學詮釋了介於生死之間人的靈悟……。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然科學又何嘗不是呢？只不過是詮釋的方式、思考的範疇不同罷了。在

中國文化裏，「歷史」這個詞本身就帶有沉重的意味，但它的沉重所在，就是思考的耗勞。

「所有被歷史迷住的人們都認識到變化——它的內容、意義和動力——是歷史上最微妙的部分，……找到這些變化的施動者給社會和人類帶來了希望。」(史密斯[Bonnie Smith]:〈序言〉，載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2。)把我們吸引到史學研究上來的原因之一，或許就是我們持久的幻想——歷史人物帶來歷史的變化，我們都可以成為歷史行動者，不僅僅是被動的遵從者。

作為大學人的韋伯

● 孫傳釗



Max Weber, *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韋伯論大學》(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Dignity of the Academic Calling in Imperial Germany*) 的漢譯本不久將要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與內地讀者見面了，想必也會

受到關心中國大學改革、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等熱門議題的非教育學科、非社會學專業的讀者歡迎。

與奧爾特加·加塞特 (Jose Ortega y Gasset) 的《大學的使命》(*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雅斯貝爾斯 (Karl Jaspers) 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不一樣，《韋伯論大學》並不是他一氣呵成的著作，而是後人希爾斯 (Edward Shils) 編譯的。此書是韋伯 (Max Weber) 的論文集，彙集的主要是當年他在《法蘭克福時報》(*Frankfurter Zeitung*)、《大學通訊》(*Hochschul-Nachrichten*) 等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收集了韋伯自身參與的伯恩哈德事件、米歇爾斯事件爭論、在第一、二、四屆德國大學教師會議上的言論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和〈以學術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 兩篇文章中的相關部分。從這些第一手的材料，可以了解韋伯在世紀交替的年代——德國大學體制發生深刻變化的年代，他對大學教師的「學術自由」概念的界定，以及他捍衛學術自由的勇氣和責任感；也可以看到他對大工業生產對德國傳統大學體制帶來的衝擊所持的矛盾心理：既為教育行政體制的日益官僚化，即政府對大學教師職位人事權的干涉導致學術自由的喪失深為憂慮，又不滿傳統的學術圈內行會性的教授自治，並看到美國大學的體制更具有活力，更能促進學者之間競爭的長處。瑪麗安妮·韋伯 (Marianne Weber) 的《韋伯傳》(*Max Weber: A Biography*) 裏，雖然也稍有言及個別有關的事件及其言行，但畢竟

語焉不詳。所以，這本小書中韋伯圍繞具體事件的激昂言說，可以與韋伯的其他著述結合起來來考察韋伯對「學術自由」、「價值中立」(*Wertfreiheit*) 等觀點的一貫立場，研究者往往也為韋伯早年的表述與晚年著述的「不一致」而困惑。

韋伯關注的是：工業大生產在德國也開始瓦解大學裏的傳統習俗和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的理念。大學自然科學和醫學領域最先出現了大型研究所。這樣的研究所，不僅只有得到教育部的撥款才有可能創建和維持，而且因為規模大，原先講座制的人事制度也發生了變化——大學教師的主力——取得了大學教師資格後不拿國家薪金的編外講師制度開始動搖，出現了類似美國大學裏的助理職位——從屬於正教授的所長、領取國家薪俸。而文科的研究班 (seminar) 授課制度也需要助理教授，進一步推廣了這種助理教授制度，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很快在整個德國普及起來。國家通過大學教師職位、薪金的經費預算牢牢地控制了大學教師的人事制度。十九世紀末，德國大學的傳統受到了衝擊，危機明顯地顯示出來，韋伯遂挺身抵抗、捍衛將要被國家行政當局或壟斷資本全部攫去的「大學人」的「學術自由」。

伯恩哈德事件是普魯士教育部第一次不經過柏林大學教授評議會認可，自行任命伯恩哈德 (Ludwig Bernhard) 為柏林大學經濟學教授，背後有隱含着「東部邊界」(Ostmark) 半官方組織對大學人事權的影響力。這個組織得到政府資助，「試圖藉着把德國農民安頓在德國東部，以扭轉波蘭季節性勞工取代

我們從《韋伯論大學》一書中，可以了解韋伯在德國大學體制發生深刻變化的年代，他對大學教師的「學術自由」概念的界定，以及他捍衛學術自由的勇氣和責任感；也可以看到他對大工業生產對德國傳統大學體制帶來的衝擊所持的矛盾心理：既為教育行政體制的日益官僚化，深為憂慮，又不滿傳統的學術圈內行會性的教授自治，並看到美國大學體制更具活力。

工業大生產在德國瓦解了大學裏的傳統習俗和洪堡的理念。大學裏的大型研究所只有得到教育部的撥款才能創建和維持，出現類似美國大學裏的助理教授制度，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很快在整個德國普及起來。國家通過大學教師職位、薪金的經費預算牢牢地控制了大學教師的人事制度。韋伯遂挺身抵抗、捍衛將要被國家行政當局或壟斷資本全部攫去的「大學人」的「學術自由」。

德國自耕農的趨勢。這一組織受到很多批評」。寫過《波蘭問題》(*Die Polenfrage*)的伯恩哈德，「了解這一組織內發生的種種事情，而這些事情是高層官員不欲公眾得知的。他身為普魯士大學的教授，從而也是公務員，因此受到公務員紀律條例所束縛，並且依賴於普魯士教育部的青睞，所以，只要伯恩哈德教授繼續留身普魯士的範圍內，相信他都會保持緘默。」(頁6，註4) 韋伯他們把由於這種原因被政府任命的教授叫做「迎合教授」，相當於我們說的「御用學者」吧！

另一方面，當普魯士政府看到不順眼的學者佔據了教授職位的時候，就任命一名迎合政府政策的人為教授，藉此來使他們相互對立，消除前者的影響力，具有懲罰前者的意思。所以，當時韋伯等人把後者取得的職位叫做「懲罰教授」。這種做法最早出現在神學院，比如為了平衡天主教與新教兩派之間、或新教內部正統派與自由派之間的教授職位的人事安排所做的任命。後來發展到一般的人文學科。

到二十世紀初，政府根據財界——德國中央產業界聯盟——的意向來任命教授又成了普遍現象，所以，出現政府控制任命權限制講壇社會主義學者佔據講座制教授職位的措施。所以韋伯說：「因為宗教上或政治上原因強加給學校的教授之職。」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是因為政治信仰被排除在德國大學門外的典型事例。眾所周知，就因為米歇爾斯是社會民主黨黨員，雖然他有出色的研究業績——那名著《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恐怕中國讀者也很熟悉，韋伯兄弟倆竭盡全力推薦他，也不能在德國取得教授資格。1907年米歇爾斯無奈地離開德國，在韋伯的幫助下，去了意大利都靈，在那裏登上了大學的講台。我們也可看到，齊美爾(Georg Simmel)這樣的哲學家因為是猶太人，也成為那種人事任命制度的犧牲品。參與論爭之中的韋伯也以自己應聘的經歷，揭露了普魯士教育部的內幕，從中可以見到他高尚的人格和勇氣。

這種國家行政權力操縱下的人事制度，靠個人的品質很難保持它的廉潔。十九世紀末柏林大學因其在普魯士的特殊地位，該大學的教授中也很明顯出現利用權力的接近和轉移謀取名利的腐化傾向。韋伯痛心地说：

在柏林大學，像其他地方一樣，也有一些具有保持強烈人格的學者，繼承、保持其學術團結與獨立於高層教育行政當局的光榮傳統。但是，人所共知，這一個群體的人數並非在逐漸增加。不幸的是，對柏林的教授來說，距教育部的大門是如此之近，很容易發生這種事情。這種令人不快的形勢一直有不斷惡化的趨向，普魯士的「地方教授」向那些實際上或據說是有影響力的柏林同事寫信訴求和抱怨，希望後者能夠在「高層決策者」中為他們說情。這種透過個人與教育部關係的權力運作(實際上已經在每個領域或多或少地以公開的形式在發展)，毫無疑問也經常被某些傑出的、具有鮮明個性的柏林學者運用於他們的學術發展。但是，我們必須指出，

即使我們有一種崇高的風氣，不懈地追求以客觀的方式來評核學術績效，但當一個人掌握這麼大的任免權力的時候，仍舊有被他個人偏愛與興趣好惡所左右的危險。(頁6-7)

當然韋伯也不滿意德國大學傳統的行會式的約定俗成的人事制度和對「學術自由」的界定，看到大生產工業社會、特別是美國大學體制帶來學術競爭的活力，而且讚賞這樣的活力。但是，對於工業社會官僚制度對大學腐蝕的負面影響的抵制和譴責，卻是他大學論的主流。關於這一點，我國內地的高等教育和教育管理學研究者的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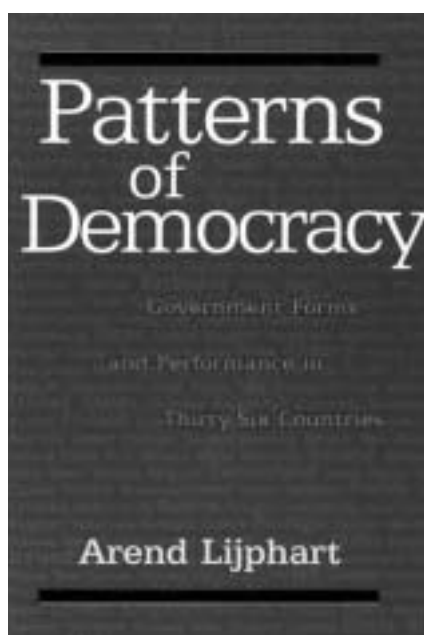
大多是一知半解轉抄他人的著述，錯誤地將韋伯作為把科層制、官僚制度合理化的理論奠基人，這是一個笑話。希望這本小書的問世，能使這一領域的這種觀念得到撥亂反正。

原書的內容大致按照年代順序，並圍繞中心議題來排列的。為了使中國讀者能更明瞭地讀懂該書，譯者在書後附錄增收了日本學者上山安敏等人收集的韋伯在第三屆德國大學教師會議上討論「價值中立」問題的言論。這樣，從第一到第四屆德國大學教師會議上韋伯關於大學的論述的第一手材料就更加完整了。

在國家行政權力操縱下的人事制度，靠個人的品質很難保持它的廉潔。十九世紀末柏林大學教授中也出現利用權力的接近謀取名利的腐化傾向。對於工業社會官僚制度對大學腐蝕的負面影響的抵制和譴責，是韋伯大學論的主流。但我國的高等教育和教育管理學研究者的著述，大多是一知半解地將韋伯作為把科層制、官僚制度合理化的理論奠基人。

民主類型與政府績效： 李普哈特的民主分類

● 陳家喜



Arend Lijphart,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授李普哈特 (Arend Lijphart) 1999年出版的《民主的類型：三十六國的政府形式及其績效》(*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是研究西方憲政與民主制度的經典之作。書